

热历史

古代如何应对洪涝灾害

近年来,随着全球极端天气增加,自然灾害频发,对我国经济,特别是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。因此,探讨我国古代应对洪涝灾害的丰富经验,及其对现代灾害管理的借鉴意义,非常重要。

灾前预防与准备

古代先民深谙防灾备患、防患于未然的方略。灾前预防与准备,既可以减少社会恐慌和混乱,又可以减少灾害损失,增强社会应对能力,保证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。

古人通过观测天象和水文变化来预测洪涝灾害。他们观察星辰运行、云雨变化,以及河流的水位和流速等,判断灾害是否临近。《吕氏春秋》载,古人将云分为“山云、水云、旱云、雨云”四种,通过云的形式对降雨进行占卜。一旦预测到灾害可能发生,预警信息就会通过特定的传递机制迅速传播。比如,明朝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曾总结出一套方法,如果出现险情,要立即悬旗、挂灯、敲锣,发出紧急抢救信号,提醒抢修,并安排群众转移。这一做法在古代被广泛应用于洪水预警中,以便民众及时采取防范措施。

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中至关重要。都江堰、大运河等,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典范,其“因势利导”的设计理念,开创性地解决了灌溉、运输与防洪排涝难题。其“早则引灌、涝则疏导”的调节机制,在促进农业灌溉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同时,也构建起可持续的防洪排涝体系。《王祯农书》载,“沟洫之于田野,可决而决,则无水溢之害;可塞而塞,则无旱干之患”,通过修建堤防、疏浚河道、设置溢洪道等措施,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民众损失显著降低。

古人通过选育抗涝作物与创新耕作技术应对洪涝灾害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载,“禹令益予众庶,稻可种湿”,说明水稻具有耐涝的特性。《吕氏春秋》《齐民要术》《马首农言》等古代文献详细记载了轮作、深耕细耙、中耕除草等耕作措施,以及因地因时耕作的规律、翻耕与免耕相结合的轮耕方式、水田整地排水技术等。此外,古人还积极推广抗涝作物种植技术,如选育耐旱、耐涝的品种等,北魏《齐民要术·种谷篇》中提到:“种谷必杂五谷,以备灾害。”

古代中国注重修建与维护道路、桥梁、堤防等基础设施。早在先秦,中国就已经有了修建堤防以防御洪水的做法,《礼记·月令》载,“循行国邑,周视原野,修利堤防,道达沟渎,开道路,毋有障塞”,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使交通运输效率大大提高,也使地区抗灾能力进一步增强。

灾时应对与救援

洪涝灾害发生时,政府与民间都迅速行动起来,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应对与救援,以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。

古代政府在灾时应对中发挥核心作用。洪涝灾害一旦发生,政府会立即启动赈灾政策,派遣官员前往灾区进行勘查和评估损失,以及调配物资进行救援。例如,明代万历年间,面对温州府“永嘉、乐清、瑞安沿江亦皆没”的洪涝灾害,朝廷立刻“诏遣吏部主事罗宽等至郡设祭,赈恤被灾人户”。政府还会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,进行减免税收、提供贷款等经济支持,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。又如,通过救荒贷赈等方式,对“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存”的贫民或流民实施救济。

此外,政府还会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灾,如加固堤防、疏浚河道、转移受灾群众等,以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。

民间慈善组织与个人也积极参与灾时救援。

在古代,许多地方都设有义仓、善堂等慈善机构,这些机构会在灾害发生时提供粮食、衣物等救援物资给灾民。《唐六典》载:“每有饥馑,则开仓赈给。”同时,许多富商大贾和士大夫也会慷慨解囊,捐资捐物,支持灾区救援工作。

灾后恢复与重建

面对洪涝灾害,古代形成“政府主导、民间补充”的协作救灾机制,既确保救灾效率,又充分调动社会资源,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。

为减轻受灾地区财政负担、鼓励灾民积极参与恢复工作,政府往往会实施蠲免赋税的政策,同时,组织官员和专家实地勘察,制定基础设施修复、农业生产恢复和灾民生活改善的系统重建规划。在此过程中,政府注重整合社会资源,调动各方力量参与重建,并提供心理疏导与社会支持,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。《宋史》载,宋太宗淳化四年河水泛滥,朝廷不仅给罹难者家属提供丧葬用具,而且向澶州、涪州灾民分别发放抚恤金,同时开仓赈济。

在灾后重建中,民间力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许多民间组织和乡绅等,通过捐赠物资、募集资金等方式,支持灾区重建。光绪《嘉定县志》载,道光二十九年,嘉定遭遇空前严重的水灾。地方富绅秦溯堂主动倡议动用义仓本钱,发放临时救助金,以抚恤民众。

(《上海法治报》)

古事汇

苏武牧羊 持节爱国

□郭莉

汉太初四年,匈奴政局持续动荡,刚刚即位的单于且鞮侯派遣使者向汉朝示好,并送还了之前被扣留的西汉使者。汉武帝在权衡利弊之后,于天汉元年,任命苏武为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。

苏武带着汉朝的国书和礼物,踏上漫漫征程。他穿过了草原、沙漠,终于来到了匈奴之地。然而,当他将带来的礼物赠送给单于之后,匈奴人却认为大汉软弱,对苏武一行满怀敌意,大加羞辱。恰在这时,匈奴的昆邪王、缙王同汉使虞常、张胜等人密谋劫持单于的母亲闾氏迫其降汉的事情败露,苏武也受到了牵连,不愿受辱的苏武引刀自杀,令单于非常赏识苏武的气节,命人救活了他。为威逼苏武投降,单于把他囚禁在冰冷的地窖里,断绝其饮食11个昼夜。苏武在冰冷的地窖里,渴了,就以雪止渴;饿了,就扯一些皮带、羊皮啃着充饥。发现苏武还活着,单于认为他受到了上天保佑,更想招降他,就让他赶了一群公羊到北海的冰天雪地之中放牧,“使牧羝,羝乳,乃得归”(《汉书·苏武传》),也就是说苏武要等到公羊生了小羊才可以回到汉朝,可一群公羊又如何能生小羊呢?

在汉廷的努力下,始元六年,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苏武,终于回到了汉朝,回到了长安城。当年随从苏武出使匈奴的一百多人,跟随苏武回来的,只剩下了9个人。出使时正年富力强的苏武,十九年后回来时,头发和胡子全都白了。回到长安的苏武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和百姓的迎接。

(《咸阳日报》)



夏县介子推文化园苏武像

记者

刘亚

摄

史海钩沉

文武兼备的岳飞



▲夏县介子推文化园岳母刺字壁画 记者 刘亚 摄

南宋时期以精忠报国为人生信条的抗金名将岳飞,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烈,时至今日依然被国人奉为忠烈化身。

岳飞的统兵才干和军事建树,使其成为南宋“中兴四将”之首。而在学识、修养与文采上,岳飞还是一位不逊于彼时文坛大家的著名诗人。一首情词悲切、意象宏壮的《满江红》,千百年来砥砺激励着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愫和报国志趣,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黄周星以诗所誉“山川不改仗英雄,浩气能排岱麓松”。岳飞的生命仅有短暂的39载,其精神风范却长存于天地之间,“千载英灵俨如在,辘轳风雨作龙吟”。他生前写就的数十篇氤氲家国情怀的诗词文赋,感召着世道人心,以另一种方式彰显这位爱国名将“归来报明主,恢复旧神州”的忠贞与坚毅。

实施重文轻武、崇文抑武国策的大宋王朝,涌现众多名垂青史的圣哲文宗。出生并成长于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岳飞,尽管少年时期“常负气节、喜读兵法”,但熟读儒家文化经典对其后来诗词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熏染。即便处于“百战回戈地,中原左衽时”的戎马状态,岳飞仍然挥毫泼墨、吟诗作赋,抒发对秀美河山的挚爱和对收复中原的渴盼,激发自身“誓将七尺酬明圣,怒指天涯泪不收”的宏愿壮志。“中兴诸将谁降敌,负国奸臣主议和”的浑浊乱世给予岳飞建功立业的周期极为短促,残酷的时局给予他诗词创作的时间更为微少,但他的诗词作品大都基调高昂、气势雄壮、节奏铿锵,律动着“斩除顽恶还车驾,不问登坛万户侯”的家国情愫。

(《中国国防报》)

河东记忆

悠悠蒲津关 浪涛逐虹桥

□晏洋

蒲津关,又叫蒲津渡,古代关名,位于舜帝都城——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东岸,东与《西厢记》故事发生地普救寺相依,西与全国四大名楼之首的鹳雀楼相望,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秦晋的交通要冲,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。唐初,河东为京畿,蒲州是长安与河东联系的枢纽。开元六年,蒲州被置为中都,与西京长安、东都洛阳齐名。以长安为中心,西北有丝绸之路,西南有千里栈道,东南有运河水道,唯独东北方向的蒲州交通网因为黄河的缘故还不是很通畅,出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迫切需要,建造规模宏大、质量上乘的蒲津浮桥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。

蒲津古桥为何要用铁牛做地锚?它为何会选用浮桥,而不是石拱桥或者木梁桥?

古代的冶金技术不如现在发



▲永济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展出的蒲津渡长卷 记者 刘亚 摄

达,铁是当时最先进、性质最稳定的金属建筑材料,可以满足长久需要。之所以浇铸为牛形是极为考究的。《易经》中有:“牛象坤,坤为土,土胜水。”为抵御黄河泛滥,铸铁牛卧河边以镇之,包括花园口铁犀(牛)、漯河市沙河铁牛、徐州镇河铁牛都有此寓意,体现了祖先对治理黄河的希冀。

由于黄河泥沙量大,造成黄河河床逐年抬高,河道摆动频繁,河水冲击力巨大,建造石拱桥、木梁桥被埋没以及冲毁的可能性较浮桥大,因此蒲州首选更加灵活、适应黄河特点的浮桥。

这座彩虹般的蒲津浮桥,是古代黄河上规模最宏伟、工艺最精良的第一桥。《通典》中记载:“开元十二年,唐玄宗始下群议,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,乃铸牛、人、山、柱,夹维两岸,久成固矣。”张说对浮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进,改木桩为铁牛,易竿索为铁链,疏其船间。

在绵延几十公里的蒲州黄河滩边,上百座粗陋的炼铁炉通过引槽全部贯通在一起,同时同步浇铸铁牛、铁人、铁山、铁柱,空气在汗水中沸腾,黑夜在铁水中燃烧……

(《中国水利报》)